

裴多菲
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裴 多 菲
诗 选

兴 万 生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上海

PETŐFI SÁNDOR ÖSSZES MŰVEI

本书根据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51年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裴多菲诗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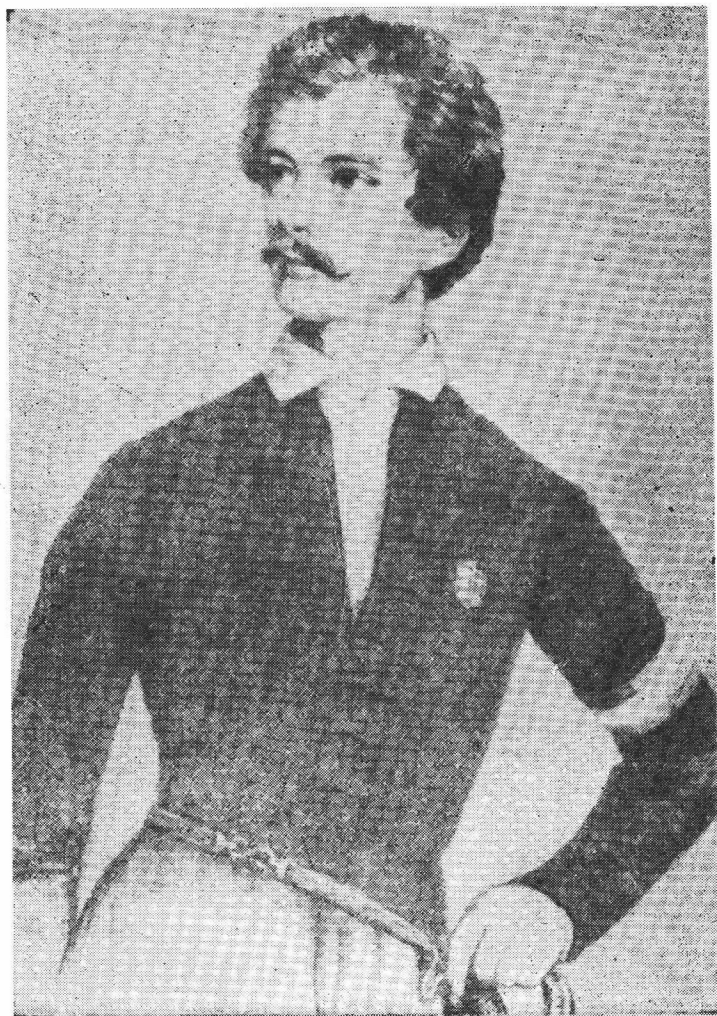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75 插页 7 字数 360,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327-0801-2/I·422

精装定价：7.60元



裴多菲

巴拉巴士·米克洛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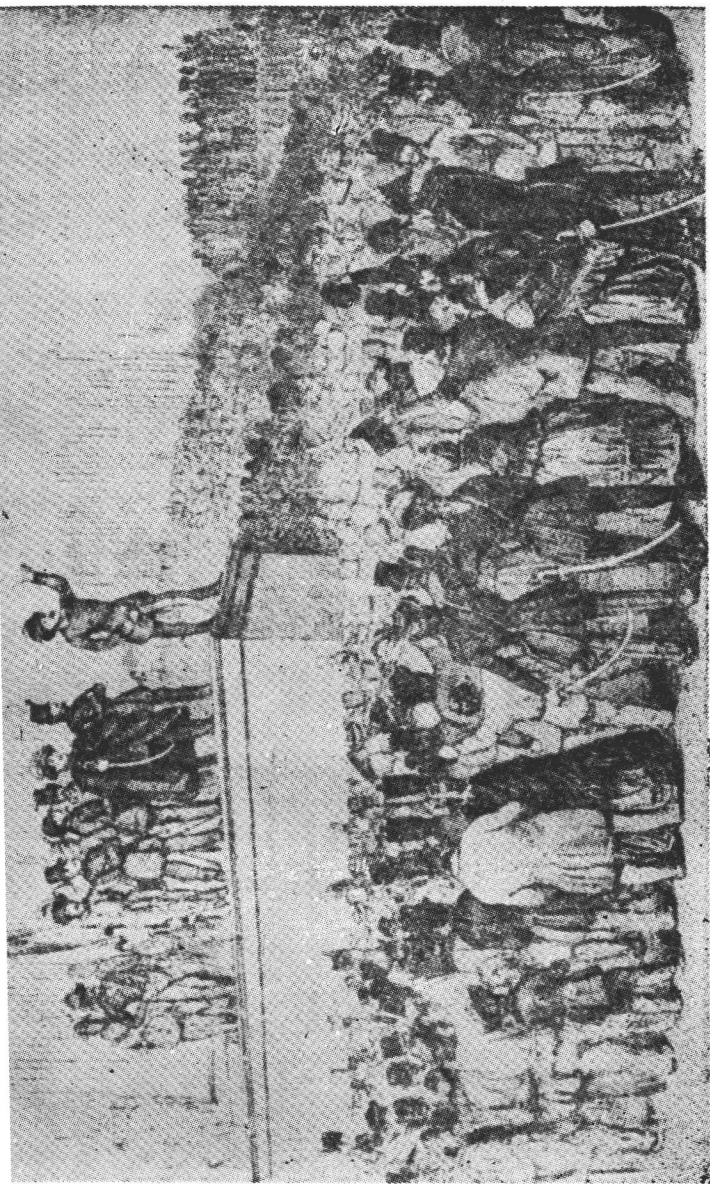
Petőfi „Dalaim” című költeményének utolsó szakasza, melyet a cenzor vörös ceruzával megfűldt, mint törlendő részt.

De mit vár a földesajánlat népe?
Mint nem hisz beléd, hogy jónak legyél?
Várva vár, hogy isten kegyelméből
Tud a vöröses eggyet lebesélni?
Dalaim, mit itt veszel szemem?
Villámházi haragos belémne?

Mellőve a törölteteket, hogy mathatik
6/8 Szp
Rusztal



这是裴多菲《我的歌》的最后一节的手稿，被书报
审查官路斯塔尔·卡洛依用红笔勾掉，并签署：“删去
最后一节，才可发表。”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斐多菲在民族博物馆前朗诵《民族之歌》



裴多菲夫人森德莱。尤丽亚
巴拉巴士·米克洛什作

译 本 序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是十九世纪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杰出战士和歌手。他以诗歌为武器抨击封建势力，同时也曾手持武器奔赴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最后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零七个月。

裴多菲的诗歌不仅在匈牙利得到最广泛的流传，而且还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他作为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他的诗歌传播的疆域到今天还在扩大；早在三十年前，他的诗歌就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①在我国，最早翻译介绍裴多菲的是鲁迅与茅盾。

裴多菲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屠户家庭。他自幼过着清贫生活。他乘驿车或徒步浪游过许多地方，夜间就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和野外帐篷里。这使他进一步熟悉了匈牙利下层劳

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裴多菲是在匈牙利古典主义浪漫派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但是他很快认识到浪漫派文学脱离现实与单纯追求形式的偏向。他抛弃了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只接受他们诗歌里接近民歌的风格，并且向民歌学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他初期的作品，题材多取自农民、牧羊人、流浪汉和村姑的生活；在语言方面，则用大众化的口语进行创作，例如《谷子成熟了》、《牧羊人骑着驴子》、《老板娘爱山盗》、《这个世界是那样的大》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并不是……》等等。今天，裴多菲的五十多首这样的诗，已经成了匈牙利的真正的民歌。诗人把活生生的劳动人民的语言加以提炼，把民歌形式加以发展，提高为出色的艺术作品。他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推翻了贵族文学家们一贯轻视农民语言的观点，驳倒了他们认为“庄稼佬”的语言只能表达低级感受的论调。诗人用极流畅的大众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都引入他前期的诗歌。鲁迅称赞他“所著诗歌，妙绝人世”，主要是指他前期的作品。

裴多菲采用民歌形式写作，这不仅是他初期的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他要进行的巨大的诗歌革命。他的“诗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继承民族诗歌的优良传统——例如从匈牙利第一个诗人巴拉塞·巴林特^②开始的、既粗犷又优雅

①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裴多菲全集》中的《前言》第三页载，从诗人死后到一九五五年，裴多菲的作品已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个角落。

② 巴拉塞·巴林特(1654—1694)，匈牙利第一个抒情诗人。

的诗风——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向民歌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就形式来说，他初期的诗歌独具一格，不落俗套；既摆脱了俗气，也摆脱了拉丁语诗的所谓严谨、而实质上是千篇一律的“韵律镣铐”的束缚，打破了德国浪漫派的作诗规范。他大胆尝试的结果，证明他的方向是正确的。

裴多非常常在小酒店、大车栈里朗诵自己的诗，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

一八四四年是诗人采用民歌体创作的丰收年。除了民歌体抒情诗之外，这一年他完成了两部长篇叙事诗：一首是讽刺史诗《农村的大锤》，另一首是用六天写成的民间故事诗《雅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这两首长诗，不论内容或形式，都是诗人学习民歌的重要收获。《雅诺什勇士》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勇敢而热情的农村青年，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和崇高的爱情，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和战场上死亡的威胁，他通过黑暗国、巨人国和神话传说中的海洋，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国土、生命的泉水和忠实的情人伊露斯卡。长诗的前五章，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从第五章开始改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故事逐渐发展到非现实的神话。这部长诗的发表，为匈牙利文学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掀起向民间学习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阿兰尼·雅诺什^①的长诗《多尔第》的发表，这在匈

^① 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匈牙利著名叙事诗人，裴多菲的战友，著有长诗《多尔第》、《多尔第的爱情》、《多尔第的晚年》三部曲。他积极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曾一度消沉，后任匈牙利科学院秘书长。

牙利文学史上被称为姊妹篇的杰作。

在裴多菲初期的诗歌中，就已经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八四四年开始，裴多菲写下了一些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等等。这些诗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它们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他在《爱国者之歌》一诗的开头，就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情感：

我是你的，是你的，我的祖国！

这颗心，这灵魂；

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

我能爱哪一个人？

裴多菲对人民争取自由的胜利充满信心，对未来世界充满美好的希望。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成为他的诗歌的创作源泉，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欧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巴黎二月革命，激励着诗人的思想，使他的诗歌越来越充满不可遏止的激情。诗人热爱人民，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同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我们探索裴多菲诗歌的人民性问题，决不能只从“诗的艺术”这一角度去看，还必须从他的诗歌作品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影响以及它们所起的教育作用来分析。正如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写给阿兰尼·雅诺什的信中所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从这里

可以看出，裴多菲是能够正确地理解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

二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处于“淡淡的哀愁”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是三个组诗：《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1845）、《爱情的珍珠》（1845）、《云》（1846）。一八四四年圣诞节，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可是相识不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死去。裴多菲经常来到她坟前哀悼，并为她写下三十四首诗。这些诗于一八四五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单行本。组诗的情调十分忧郁，低沉；表现了一个青年对初恋的天真怀念，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交响诗。《爱情的珍珠》是诗人献给麦德尼亚斯基·伯尔娜的爱情组诗，共四十首。诗的技巧与意境比较成功，抒情味很浓，例如《我愿意是树，假如……》、《假如上帝……》等等，都是十分著名的诗篇。诗意醇厚，感情真挚，想象丰富，是这部组诗的特点。《云》组诗包括六十六首短诗。这些作品激动人心，表现了裴多菲在向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追求，以及彷徨、徘徊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反映出裴多菲向往法国革命、痛恨封建社会的一种急切心情。短小精悍，匕首般的锋利，是《云》组诗的特点。

希望是什么？……是可恶的娼妓，
不管谁，她都同样地拥抱。

当你失去了无价之宝：青春，
那时候她就把你抛掉，抛掉！

——《希望》

《希望》是《云》组诗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反映了裴多菲对祖国的前途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朦胧与晦暗的心境。诗人在写作《云》组诗时，感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黯淡，感伤和绝望的阴云笼罩着诗人的心灵，统治着他的整个精神世界。裴多菲在考察匈牙利的实际社会之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感到势孤力薄，不能不感到最后胜利的渺茫。这正说明诗人的思想越来越靠近现实，说明他在逐渐摆脱那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当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当他剖析了丑恶的现实社会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绝望与感伤。

在“淡淡的哀愁”时期，绝望的诗他写过，不畏强暴的战斗诗他也写过。头脑中时而闪烁希望的火花，更多的却是泛起“绝望”的微波。裴多菲并不否定“绝望”，也正如他不能全部肯定“希望”一样。在“绝望”中蕴藏着对未来事物的希望的萌芽；在“希望”中仍然潜伏着“绝望”的恶运。他开始运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过程。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仍然是一位平民诗人，尚未跨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阵地。直到一八四八年，他的诗开始“渐倾于政事，盖知革命将兴”^①，他的“淡淡的哀愁”的消沉思想，才逐渐消散。

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辞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

^① 引自《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九七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辑职务，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乘驿车向喀尔巴阡山脚下前进。他几乎游历了整个匈牙利北部山区。同年夏天，〈旅行札记〉发表了。在这篇游记中，诗人除了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讴歌祖国壮丽河山之外，对当时盘踞在匈牙利文坛上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有力的讽刺、批判和揭露。这篇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德国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的影响。诗人有时兴之所至，感情迸发，描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这篇游记是诗人前期的作品，写作本篇时，诗人刚满二十二岁。那时他的思想尚未成熟，所以他对旧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还显得不够坚决和透彻。

年轻时期的军队生活，到处飘泊流浪，给诗人带来了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诗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人物，使他进一步了解到奥匈帝国军队里士兵生活的悲惨。正如他后来写的回忆性质的诗篇〈士兵的生活〉(1847)中所描写的那样：

你看士兵之间多么友爱！
假如逃跑，就捉你回来，
鞭刑队打得你皮开肉绽，
你走啊，你跑啊，怎样都行。

自从一八四四年裴多菲定居佩斯以后，他一方面看到了京城的辉煌、富丽、奢华，大贵族地主的穷凶极恶，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桥头的乞丐、纤夫，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身影。裴多菲憎恨那些享福作乐的

贵族地主阶级，他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无情地斥责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老爷。例如《匈牙利的贵人》(1845)、《人民》(1846)等诗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与此同时，诗人对劳苦大众抱着无限同情，并号召他们走出“草棚”，团结起来捣毁“宫殿”(《宫殿与草棚》)。

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叛精神，遭到封建复古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他们狂妄地宣称：“裴多菲把农民、牧羊人、山盗的粗鲁语言带到诗歌的神圣的宫殿里来了。”^①并且攻击裴多菲诗歌的民主主义精神，说什么“他在为无知的、卑贱的人歌唱”^②。这些叫嚣丝毫阻挡不住广大人民群众对裴多菲的热爱。他写下了最著名的《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一诗：

假如将来从那满满的篮子中，
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拿取，
假如将来在那权利的桌旁，
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占有一席，
假如灵魂的光辉也同样地
把所有的房屋的窗子照亮，
那时我们就说：“停下吧，
我们已经到达了迦南^③！”

①② 转引自霍尔瓦特·马尔顿著《我们的旗帜——裴多菲》一书，第二〇〇页，一九五〇年，火星出版社，布达佩斯。

③ 迦南，巴勒斯坦及其毗连腓尼基一带的古称。《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中称为“流奶与蜜之地”。

裴多菲的作品中带有蒙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激进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他强调作家的责任，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作诗歌。因此他的诗与民族传统、人民生活紧密结合，与人民的斗争和命运息息相关。他强调作家同群众的联系，强调作家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不仅在一百四十年前看来可贵，就是今天也还值得提倡。

一八四六年春天，裴多菲组织起“十人协会”，它为后来形成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裴多菲领导下，出版了进步的文艺刊物《生活景象》杂志。通过研究欧洲革命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他的“孤独”与“哀愁”逐渐减弱，革命的信念日益增强，他的世界观产生急剧的变化。他得出一条结论，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妥协派的改良主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所以在他起草的作家团体的纲领中，提出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我们不要老是用补钉上面打补钉的方法来修理国家这只破鞋子了，我们要把国家从头到脚修饰一新……”他以政治抒情诗为创作的主导方向，陆续写出许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打倒统治者的诗篇，如《贵族》、《我的歌》等等。

三

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特别是匈牙利国内的农民起义，冲去了裴多菲短暂的孤寂，使他振奋起来，向革命迈进。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裴多菲将自己的诗歌编辑出版，写了《诗歌全集》序》这篇著名的文章，并在扉页上题签了《自由与爱情》的

革命箴言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①这首小诗是裴多菲向革命迈进时发出的誓言。诗人用凝练的语言，集中表达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们的共同心声。诗中的三个因素（生命、爱情、自由）在匈牙利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对于青年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曾经起过积极的教育作用。

值得提到的是裴多菲后期的爱情诗。这些诗几乎全部是写给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这就是从一八四六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纳吉—卡洛伊完成的《给尤丽亚》一诗开始，到一八四九年三月诗人牺牲前完成的《我又听到了云雀歌唱》为止的一百多首诗篇。这些爱情诗是健康的，真实的；一方面表达了青年人的纯真爱情，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特别是婚后的爱情诗，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内容，如《九月的最后一天》、《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旗帜》、《告别》等作品，贯穿着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崇高思想：

将来所有被奴役的民族
砍断了铁链，挣脱了枷锁，
红红的脸，红红的旗帜，
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
“全世界的自由！”
被奴役的人民大声吼叫，

^① 此处采用白莽（殷夫）的译文。依匈牙利文翻译的译诗，见本书第一六九页。